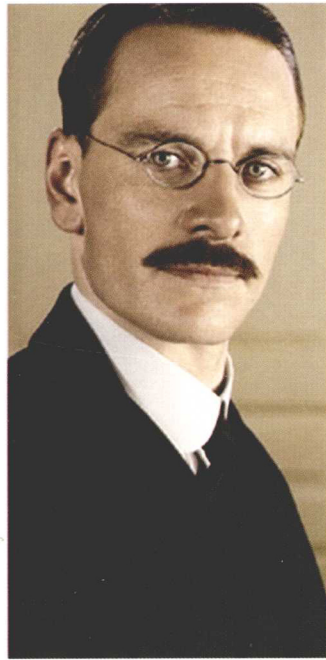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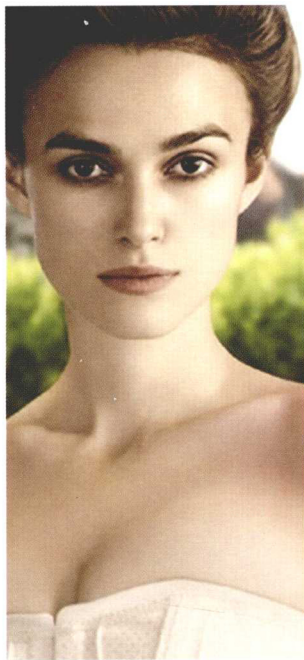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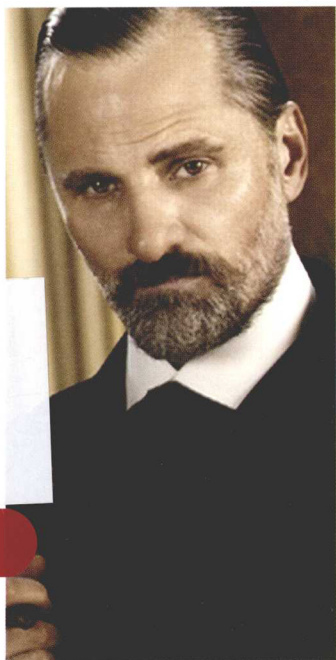


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

这是一部瑰丽无比的文化史诗，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这是一部堪称典范的无畏之作。若你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充满兴趣，
且来读一读这本书吧，你必会有所收获。——《旧金山纪事报》

危险方法

[美国] 约翰·克尔 著 成颢 译



危险方法

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

A Most Dangerous Method

[美国] 约翰·克尔 著 成颢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方法: 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 / (美) 克尔 (Kerr, J.) 著;
成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4
书名原文: A Most Dangerous Method
ISBN 978-7-5447-3376-2

I. ①危… II. ①克… ②成… III. ①荣格, C.G. (1875~1961)—生平事迹 ②弗洛伊德, S. (1856~1939)—生平事迹 ③施皮尔赖因, S.—生平事迹 IV. ①K835.226.2
②K835.215.1 ③K83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3400号

A Most Dangerous Method by John Kerr
Copyright © 1993 by John Ker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129号

书 名 危险方法: 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

作 者 [美国]约翰·克尔

译 者 成 颢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199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毫米 1/16

印 张 35

插 页 2

字 数 522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376-2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有些人很幸运，能够拥有三位父母。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以及梅布尔·格鲁姆

我希望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们可以将他们怀有的理念推向极致，这样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他们的深意。他们的确用强光照亮了人类的本性，但是我承认，弗洛伊德给我个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被一些固执的观念给纠缠住了。就我自己而言，使用他关于梦的理论进行工作，我一无所获，而且很明显，“象征主义”是最危险的方法之一。

——威廉·詹姆斯致泰奥多尔·弗卢努瓦

1909年9月28日

目 录

致谢	1
引言	4
第一部分 一个癔症病例	17
第一章 她父亲的手	19
第二章 精神病修道院	38
第三章 荣格的试验病例	59
第四章 天性虚伪的女人	73
第二部分 关于神经健康的新学说	99
第五章 苏黎世学派的兴起	101
第六章 荣格与弗洛伊德	125
第七章 关于童话故事的科学	154
第八章 性与心理学研究	188
第三部分 运动	227
第九章 美国之旅与核心情结	229
第十章 有两片头盖骨的房屋	255
第十一章 国际精神分析学会	270
第十二章 精神分析中的唯灵论倾向	285
第十三章 垂死而又复生的上帝	306

第四部分 密友事件	335
第十四章 关于转换	337
第十五章 一场友谊的终结	376
第十六章 唯余沉默	404
第五部分 余波	427
第十七章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429
第十八章 寻找伟大的命运	465
后记	494
参考文献	498
索引	518
译后记	547

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最终才得以问世。他们将自己的兴趣、耐心以及慷慨，无私地馈赠予我，才使我在这三方面没有将自己全部耗尽。首先，我必须感谢**Paul Schrader**，正是他激发了我写作这本书的想法，在我翻译施皮尔赖因早期论文的工作中，他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对我而言，**Schrader**算是一位意料之外的导师，他不仅完全依靠着直觉，在那些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背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还以世所罕见的聪慧与诚恳，追寻着这个故事的踪迹。

Peter Swales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同事，我想要对他表达的感激之情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若不是我很早就对**Swales**的研究工作有所领悟，我必定会误入歧途，正是他那些尚未发表的作品帮助我与鲁莽无知划清了界限。**Swales**长期从事着关于弗洛伊德的档案学研究，他孤独地工作着，从史料中挖掘出了很多崭新的信息。与所有尚在人世的学者相较，**Swales**的工作成果是无人能及的。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早期历史的藏书，他的私人藏书堪称世界级的宝藏。而他将这些藏书交由我任意使用。所有与**Swales**相识的人都会发觉他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信息宝库——他非常乐意抽时间与我讨论那些难以揣测并且异常复杂的疑难之处，如果我需要的话，即使是一大清早，他也愿意与我讨论。

Schrader和**Swales**让我得以开始我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Robert Holt**，这项工作还是会泥足深陷，无法深入下去。他对我的研究工作极具兴趣，还为我的博士论文提供了赞助。在心理学界，**Holt**在学术方面的勤勉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我从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而对于科学考证的逻辑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的错综复杂之处，**Holt**教授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深深觉得：我欠他的实在是太多了。

Swales和Holt对我来说意味着弗洛伊德，而Sonu Shamdasani对我而言意味着荣格。多年以来，Shamdasani一有空闲便与我讨论，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找到他。他还与我分享了他自己的档案学研究，以及他自己正准备出版的关于荣格的一部杰出传记。我特别想要感谢他的一点在于：正是他发现了荣格早期和比奈之间的联系，发觉了迈尔和弗卢努瓦等人对荣格的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识别出了施皮尔赖因的词语联想实验协议。Eugene Taylor, Anthony Stadlen以及Ernst Falzeder等人也不吝时间，以他们渊博的学识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还有一位名叫Anthony Econom的历史系学生，他爱书如命，在过去的十年间不断地给予我各种建议和指导，为我提供一些罕见书籍的单行本，偶尔还对我做出批评指正。荣格的《移情与象征》1916年的英文原版曾经一度难以觅得，Econom找到了两份复印本，他将其中一本送给了我，另外一本留给自己，与我同时进行阅读，并随时注意着他在哪些方面与我存在着争议。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与引导，这本书根本就不会问世。还有另外三位爱书者，他们是Jack Molloy, David Little和Heather Waters，对他们一直以来给我的帮助，我心中充盈着感激之情——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倾听我念叨着弗洛伊德、荣格和施皮尔赖因，换作是别人，怎能忍受我呢？

我还想对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历史部表示特别的感谢，这个由Eric Carlson创建的部门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想法，并为我提供了教育方面的支持。这个部门中我特别想感谢的人包括Larry Friedman, Jacques Quen, Leonard Groopman, Dan Burston, Marianne Eckhardt, Nate Kravis, George Makari, Anna Antonovsky, Doris Nagel, Norman Dain, Ralph Baker, Barbara Fass Leavy, Leon Hankoff, Herb Spiegel以及Cornelius Clark。其实，既精通历史学，又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是极难寻获的。而且，具有这些特点而又乐于分享的人，就可能更为稀有了。

我的法语只处于基础水平，专业术语也懂得不多，而德语我根本就不会，因此，在翻译方面我完全依赖着别人为我提供的帮助。在这里，我要向Ursula Ofman, Peter Gachot, Julia Swales, Marie-Louise Schoelly, Tanaquil Taubes, Michael Munchow以及Michael Norton等人不知疲倦的帮助致以特别的谢意。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图书馆查询系统甚至图书馆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医学院Countway图书

馆特典部的Richard Wolf先生、纽约精神分析协会A.A.布里尔图书馆的Taylor女士；特别要提到的还有纽约C. G. 荣格学会Kristine Mann图书馆的Doris Albrecht和Peggy Brooks。

如果没有Emy Bianco的帮助，这本书可能至今都只是一份手稿。她 XI
不仅帮我找到了一个出版商，还亲自找来了一位编辑：Peter Dimock。他在叙事方面极为敏感，同时还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诸位读者可能根本无法想象这本书中他的功劳到底有多大。我还需感谢Melvin Rosenthal, Ellen Shapiro以及Carol Devine Carson等人呕心沥血的奉献和充满灵感的努力。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许多研究经常需要借钱才得以进行。在这里，我必须向那些倾囊相助的人们表示谢意：Jack Molloy、Darvid Little, Anthony Elonom, Lester Berentsen, 我的兄弟Chris和Collin。我还要感谢Jack Benson和Joseph以及Michael Diliberto等人这么多年的资助和支持。我还要感谢Sara Weber, Robert Langan（他们俩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朋友）以及Steven Cecere，他们经常十分慷慨地让我这位租客缓缴房租。

Ruth Ochroch, William Blackwell, Ted Coons, Paul Vitz, Richard Noll, Dennis Klein以及Carol Janeway等人在我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珍贵的建议。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人，感谢他们对我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Gene Anderson以及Judy Robinson（还有Eleanor），Susan Coates, Vincent Russo, Paul Stepansky, Jackie Balzano, Frank Sulloway, Andrew Lubrano, Rosemarie Sand, John 和Deanna Robins, Deborah和Daniel DeLosa, Mark Micale, Damien Dummigan, Richard Schimenti, Frank Kominsky, Eric Benson, James Van Meter, Phyllis Grosskurth, Peter Rudnytsky, Toby Gelfand以及Ralph Martin。

约翰·克尔

3 引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荣格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07年的3月3日。那天他们连续交谈了十三个小时。两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第四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这次大会于1913年9月7日至8日在慕尼黑举行）。据说他们那次见面的时候相对无言，因此，这场史上最令人纠结的搭档关系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结束了。然而就在他们共事的这短短六年时间里，他们却使20世纪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这个故事正是关于这对搭档的。我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让大家了解他们的生平，也不是想辨明究竟孰是孰非。我只是想谈谈他们在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作出的成就，并想就这项成就的本质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

在二人共事的岁月里，弗洛伊德和荣格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并且使这一诠释性的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这些观点里面，有一些是极具颠覆性的，也正是这些观点使精神分析显得卓尔不群。没有他们，更确切地说，没有他们的合作，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精神分析就根本不会存在。虽然说弗洛伊德和荣格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极为新颖的发现——这些发现的价值直到现在我们都有体会——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以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方式塑造了这些成果，这种方式体现了他们自己当时的特殊需求，也最终造成了很多误解，而这些误解对于认识以及理解他们的发现是极为重要的。

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必要得到阐明，但是对他们的故事进行批判性地讲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想要尊重的人。我们宁愿将他们视为英雄，视为充满魅力、仁爱、具有批判精神而又极其明智的人物，我们更想让他们传奇故事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万古流芳。可以说，弗洛伊德与荣格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来面对人类自

己的心灵，他们承认了人类的局限性。而这一切也使得他们成为最先向自己开刀的那一批思想家，也必然使他们自身承受着自我反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但是，这种反省正是现代人之所以成为现代人的标志。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20世纪最早的公民。这种自我意识的崭新形式是需要个体用他们自身来进行支撑的，想到他们拥有这样的美德，我们就无比欣慰。

从未有人能够像他们那样，即使在反叛自身的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对他们人格的钦佩。弗洛伊德和荣格在晚年的时候，都因为自身的处境而站到了自己理论的对立面，但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依然显得游刃有余。弗洛伊德曾说：“其实有时候雪茄只是支雪茄而已。”我想我们对这句话都很熟悉，但其实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并非只是一句玩笑。如果非要举一个更为恰当的例子，可能是他对阿布拉姆·卡尔迪纳（当时卡尔迪纳正在接受分析培训，他对某个精神分析定理的逻辑性产生了质疑）说的那句话：“哦，别把这话太当真，那是在某个下雨的星期天午后凭空想出来的。”弗洛伊德这句傲慢的回答将自己不屈不挠的性格凸显无遗。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纳粹当局要求弗洛伊德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才准许他离开维也纳，也就是让他声明纳粹待他十分友善。弗洛伊德当时的反应可谓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他签好自己的名字，沉思一会儿之后，又随即添了一句附言：“我要向每一位同仁衷心推荐这位盖世太保。”

荣格也很令人困惑地与自身保持着距离。荣格曾经一手创建了自己的学会，但是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却悄悄地告诉一位同事说：“谢天谢地，我可不是一个荣格主义者。”荣格对待患者的方式也很直接。有一名年轻女患者的情欲移情没有得到荣格的回应，她也不愿意再和荣格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她直接提议两个人应该到沙发上躺在一起，荣格回答说：“是的，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最后还是得起来接着谈这个话题。”荣格声名远播，并不差于他那位维也纳的旧友。荣格晚年的时候曾在伦敦旅行，有一天下午，他独自来到大英博物院的阅览室，想要寻找一本十分罕见的书。保安在入口处很有礼貌地拦住了他，问他的通行证在哪里。荣格说自己没有通行证，但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来自苏黎世的荣格，而且他并不知道这里需要通行证。保安听到这个名字以后有点发怔，他惊讶地问：“卡尔·荣格？你的意思是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荣格巧妙地答道：“不……只有荣格一人而已。”（他就这样被准许进入了。）

这些轶事都发生在他们的晚年，但我们的故事讲的却是他们早期的合作。这是一段黯淡的岁月。当时的他们，虽然已经显现出上述这些令人

- 5 尊敬的品质，但与后来的自己相比，那时候的他们显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武断、不容异己，也更加有占有欲。成功通常可以磨砺一个人的性格，但是抱负本身却做不到这一点。在他们合作的那段时期，弗洛伊德与荣格一直都在被他们将要迎来的伟大成就所磨砺着。

我们应当注意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20世纪伊始，那时候心理疾病还被称为“神经”障碍，整个欧洲以及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都空前高涨，各种心理治疗试验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有一些人想要努力理解神经问题的本质，而另一些人则想要通过纯粹的“心理”方法改善这些神经问题。这种双重的趋势是由当时西方世界存在的多种因素导致的。首先，西方世界当时在经济上呈现出了总体繁荣的现象。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人们有资金富余，总会花在自己身上。人们如今希望解决的那些麻烦事儿，在世事维艰的时候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发生精神错乱的几率相当之高。现在的人们可能都已经不记得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习惯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底楼的房间里备着装有碳酸铵的小瓶子，以防不时之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女士们经常会突然发病昏厥。其实发病的患者并不仅限于女性。那时候的男人也会如此。他们也受着各种心理和生理症状的困扰，也许是现代文明的快节奏生活给人们的神经系统带来了过重的负担，不过这种说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争议。

- 有些疾病确实存在性别差异，但是癔症虽然广泛发作于女性群体，却并非只有女性才会罹患此病。而神经衰弱、强迫性神经症、强迫状态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征则通常用来诊断男性的病症。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标签之下，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关于遗传特征的恐怖诊断——医生们都以医学理论为豪，但遗传问题却是理论的破坏者，它击碎了患者祈求康复的全部信心。在那个时代，许多内心敏感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很健康）都身处尴尬之境，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问心无愧当作借口，来安慰自己内心不可言说的疑惑；或者通过繁重的工作使自己精疲力竭，长途跋涉去温泉浴场旅行，以回避自己心中不祥却又挥之不去的颓靡；他们研究哲学和政治，
- 6 投入社会事业之中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使自己不致沉溺于内心莫名的悲伤。毅力与正直——人类品质的两个源泉似乎被什么东西从内部给神秘地破坏掉了。

与此同时，19世纪末期的神经病学却对上述问题一筹莫展。尽管关于神经系统基本功能的一些观点赢得了大家的关注，但是这些理论与神经

类疾病的关系仅限于一些医疗术语的陈述——什么“能量”和“放电”，还有“紧张”和“疲劳”之类的词语，这和患者对自己病情的陈述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电疗、溴化物治疗以及外科手术等物理性质的治疗方法也未能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功，而另外一个论调则甚嚣尘上：治疗中起到效果的不过是医生对患者的暗示作用。催眠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颇有疗效的疗法，但是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争议。如果人们的思维在恍惚的状态之下更容易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在清醒的时刻却不行呢？而且这又如何能说明神经类疾病的本质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又是什么呢？

因此，神经类疾病引发了无数有趣的科学问题，其中一些疑问至今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那时候，任何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将带来名垂千古的荣耀，单凭这一点就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物投身到神经病学领域之中。对神经类疾病的研究如此盛行的因素有很多，而哲学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时，科学唯物主义第一次成为了主流的世界观。那时的人们都觉得科学已经在与宗教以及形而上学思想的搏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唯物主义马上就会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作出科学的解释。可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人类该如何定义自己体验的另外一端——自我呢？在注重前因后果的唯物论世界中，似乎根本就没有自我思考、感觉以及意志的容身之所。这种悖论比比皆是。至于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到现在都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神经系统与意识以及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关于神经类疾病的永恒话题。它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却一直徘徊不前。若是将人的感知现象与解剖学、生理学方面的发现联系起来，必定会衍生出哲学上的重要分流。因此，如果一个医生时常与神经类疾病的患者打交道，同时又开始涉足哲学领域，我们也并不会感到惊讶。人们经常会将神经障碍与奇特或者神奇的事情紧密联系起来，譬如降神会、精灵、心灵感应之类的灵异现象，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似乎直到现在仍是唯物论世界中不可填补的裂缝。

所有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医学家走向了那个开放的研究方向，投入到了心理学研究以及心理治疗的实验之中。这股洪流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虽然它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称为一场“心理治疗运动”。然而就在十余年之后，这一运动几乎陷入了绝迹的地步，最初轰轰烈烈百家争鸣的势头早已不见，只有其中的一支幸存了下来。

回顾往事，精神分析居然能够风驰电掣般地蓬勃发展至如此地步，无疑令人感到惊讶。1900年的时候，虽然医学界的大部分学者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癔症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神经类综合征的理论都略有耳闻，但是这些理论夹杂在当时各式各样的理论之中，并没有显得特别出类拔萃。弗洛伊德用自己心爱的精神分析法得出了这些理论，但人们却更觉得这只是一个噱头，并不是一个科学模型。大众可能经常听到这样一种看似合理的论调：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手中可能的确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但是这种方法不能传授，别人也学不会，如果没有什么天分，用这种方法肯定会一无所获。

但是到了1911年，仅仅过了十年的时间，精神分析这个一向无人问津的方法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它引来了尖锐的攻击和大规模的争议，从而也变成了欧洲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最为关注的话题。1926年，一个统领学界的秘密“委员会”解散，精神分析便成为心理学与心理治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并吸引着大量医学专业甚至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与追随者。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奥登在给其的悼词中说道，精神分析已经成为“最主流的观点”。弗洛伊德对神经病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科学和哲学的味道，因此他的学术境界也愈发高深起来。人世间的神龛一直都摆放在原处，如今，我们的世界呼唤着弗洛伊德走上神坛。而荣格必须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神位，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为宗教和神秘体验保留了一席之地，然而这一点正是弗洛伊德个人所深恶痛绝的。

- 8 这便是精神分析的崛起，它迅速占据了学界的主导位置，完全代替了早先的学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很多思想家的名字和成就烟消云散，为精神分析理论打下坚实基础的那些极具养分的观点也从此湮没无声。其实，那时候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的时机已然成熟，除此之外，还流传着许多野史传说，以及一些真假掺杂的故事，其中有许多传闻的始作俑者就是弗洛伊德本人。这些传闻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按照这些说法，据说，最开始只有弗洛伊德认真而坦诚地思考了人类的性问题，也只有他一个人认真地对待了无意识问题。也正因为这种孤独，他被彻底地忽视，被恶意打击，被同时代的人们逼迫着，一直在科学领域过着流浪儿的生活，直至整个世界追上了他的脚步。上述这些说法显然是失实的，但是直到最近二十五年左右，历史学家们才有信心开始纠正这些失真的记录。

还有一些流言是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之起源的。据传，他最先是在临床工作中得到了启发——弗洛伊德的一些想法确实来自于他的患者——然后他勇敢地进行了自我剖析，最终拓展了自己的发现。这种说法也是失实的。如今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弗洛伊德其实是从自己的藏书中获取了这些理念；而这些理念在当时的治疗中已经得到应用的说法，则是相当离谱的。关于自我分析的那些说法，直到最近才开始经受严格的推敲，虽然现在得出最后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已经知晓，其实弗洛伊德通过所谓的自我分析得到的“理论成果”，从别的渠道也同样可以获得。

还有另外一些流言与本书密切相关，它们关系到精神分析在20世纪早期的发展，当时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由于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奠基人，因此，大多数评论家都觉得从维也纳的角度来讲述精神分析运动的故事显得更为自然。如此这般，这个故事就成了弗洛伊德逐渐完善自己的理论、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的过程。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对精神分析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心存疑惑，后来脱离了精神分析学派，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分支。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它弱化了派系之间的争斗，削弱了其他学术分支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这种观点对于那些精神分析反叛者的追随者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这使9 他们得以想象自己追随的偶像从一开始就持有自己独特的观念。

其实这一观点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它将弗洛伊德的理论高度和影响力看作是一开始就理所应当存在的，而忽视了当时欧洲医学界的实际情况。那时候，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弗洛伊德，而是荣格及其良师益友——欧根·布洛伊勒。作为精神病学界的先驱性人物，荣格与布洛伊勒早已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另外，他们还受到苏黎世医学院的支持，掌控着苏黎世精神病诊疗中心及其附属的心理学实验室，吸引着大批的医生前来接受培训。简而言之，荣格和布洛伊勒掌握着极为必要的学术资源，而精神分析经由这些资源才得以演变成一场科学运动。精神分析流派的崛起本身就直接反映出了这一学界现实。荣格和布洛伊勒以自己手中的患者为例证，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某些理念，一场巨大的争议就此发生了。弗洛伊德早期的那些重要门徒，几乎都在苏黎世接受过培训。精神分析学派的第一个官方机构同样是在苏黎世成立的：第一次大会，第一份期刊，机构成立时举办的第一场国际研讨会——所有这些“第一”全部都是在苏黎世诞生的，而不是在维也纳。正是荣格和布洛伊勒将弗洛伊德放到了科学的地图之上，而不是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和布洛伊勒。

讲述精神分析运动的故事，应该以苏黎世与维也纳之间的联系作为线索。这个视角会使我们认识到在荣格与布洛伊勒登场之后精神分析理论所产生的重大转变。从原则上来说，既然精神分析声称自己是一门科学，那么其发现就应当可以被其他人所重复。弗洛伊德对此早已有所觉察，而且他试图利用这一点，将自己作为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样本展现在荣格与布洛伊勒面前。而荣格与布洛伊勒那边则通过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会给弗洛伊德以某种回应。起初，这样的计划似乎是你情我愿之事。而且，弗洛伊德的优先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除了优先权之外，这一科学的重大发现并没有任何知识产权。尽管当时弗洛伊德非常期望苏黎世能够成为国际精神分析中心，但这个希望却最终泡汤了，而且并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但是，弗洛伊德的抱负并未仅仅停留在科学领域；他极少在自己理论
10 的实验验证方面投注关注，也不费心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也从不理睬学术同僚进行研究的那些传统方式。精神分析一俟穿上了日常科学这件套装，就开始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多个学科领域。它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临床治疗方法，而是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方面的运动，并且发展成为了一种世界观。荣格出于自身的一些原因，很愿意掺和到这一改革进程之中。然而布洛伊勒却不这么想，于是他逐渐从这些运动中隐退了。当整个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学会方面的合理性也就随之改变了。因为在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方面的运动中，也确实存在着所有权方面的问题。所以，当弗洛伊德对荣格不再信任时，他必然会决定重新夺回对精神分析的控制权。

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对抗对他们各自科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对他们本身也造成了伤害。弗洛伊德为了重新夺回控制权，几乎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光彩的事情。他将自己最新的治疗手段当作手中利器，试图通过自己对荣格个人生活的了解来控制他的观念，但是这种做法对荣格来说是不堪忍受的。荣格试图挫败弗洛伊德施加的压力，但他当时仍然是这一运动的正式领袖，却轻率地想要将精神分析学说基督教化，这种做法自然也有欠妥当。荣格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弗洛伊德对他的指责，荣格终于被逼无奈，想要使用同样的伎俩来报复弗洛伊德——向世人揭开弗洛伊德私生活的面纱。回顾往事，其实两人分道扬镳之后反而获得了各自的自由。他们谁都不愿毁掉两人费心尽力建立起来的一切，他们也曾经一度为此竭尽所能。但在多年的合作之后，他